

消费站上“C位”还有哪些难点

深评

开年以来，省内多地已经发放多轮消费券，力度大，诚意满。拼经济，消费是首先要拿下的“桥头堡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《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》中强调，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。消费优先，需要让消费恢复更快、消费场景更优、消费内容更靚、消费方式更潮，让消费稳稳站上经济发展的“C位”。

一轮轮消费券发下来，效果到底好不好？以杭州为例，在春节消费券发放期间，全市堂食的订单量同比增长71%，交易额同比增长80%。除了跟防疫措施优化调整有关外，相信消费券也发挥了刺激作用。而“喜迎新春”宁波消费券创新消费券品种，新增留甬过年券、春节团餐券、云上年货消费券等券

种，拉长消费链条、放大消费效能。满满人间烟火气，是经济最动人的图景。可以说，消费券犹如一针催化剂，以四两拨千斤之势，点燃了线下消费的热情，让消费市场迅速升温。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3个多月以来，在消费券等微观手段的直接刺激下，消费复苏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。

消费作为最终需求，是拉动经济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，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，并且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。但是，目前消费距离“C位”还有差距。这波消费潮，无论是从持续时间还是范围、广度来看，跟我们期待的“报复性反弹”还有距离，需求不足等深层次矛盾仍然需要解决，推动消费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增长仍面临制约。正因如此，更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上优先位置。

消费优先，不能仅仅就消费言消费。要看到，目前的消费力是从

前几年的“洼地”走出来的，恢复和扩大消费，依然面临着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还未完全修复的不利局面。此外，国内有效供给能力不足，对更好满足消费需求形成制约，新兴服务和中高端产品供给，还不能很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。消费的安全性、及时性、便利性还不够，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有不利影响。因此，除了较为直接的发放消费券之外，还需要更多长效手段，比如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、创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、培育完整的消费体系、提升消费产品的价值、提升供给质量、提振消费信心。最终，让消费的高质量增长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。

消费优先，就要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。钱包鼓了，消费才有动力。有学者认为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“当务之急”，“消费优先”须坚定完善分配格局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近日印发的《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（2022—2035

年）》提出，未来要使分配结构明显改善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。只有人们的钱包鼓起来，内需潜能才能不断释放。

消费优先，还要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。让居民有钱花，也要敢花钱。春节长假期间，一些消费者权益受损事件也时有发生，诸如“6根面条卖20元”“餐馆一声新年好收10元服务费”等，让人如鲠在喉。所以，要营造法治化的消费环境，不断改善消费体验和预期，切实提振居民消费信心，有效满足居民个性化、多样化消费需求。

春暖花开，烟火渐浓。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的发展窗口期稍纵即逝，要牢牢抓住时机，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，通过综合施策，尽快让消费站上经济发展的“C位”。

（逯海涛,载《浙江日报》）

助学之暖,是一场爱心接力

暖意不会凭空产生，它只是在人们间传递。

近日，有两个名字被网友反复提起。一位是前高校教师，退休后靠拾荒资助学生，最后的心愿是捐赠遗体。一位则作为中学老师奋战到了生命最后一刻，去世后被发现曾资助20余名学生。王坤森与宋文武，他们的事迹令许多人热泪盈眶。

教师是学生的“引路人”，长期相处中最了解其物质和精神需求。衣袖上的破洞，花季少女的劳保鞋，被他们看在眼里；渴望求学的“大眼睛”，打工筹学费的学子，被他们记在心上。课堂上，他们是尽职尽责的授课者；生活中，他们全

力帮助学生渡难关。此番善行，又一次引发我们对“好老师”标准的讨论。

助学之暖，日积月累，是一份最为朴素的感动。靠拾荒资助学生，金额并不大；教师工资一省再省，发挥的作用终有限。受助者是少数，为何我们仍会被深深触动？因为这份暖意触手可及，多数人曾感受过来自他人的朴素关怀，情感上容易产生共鸣，思想上备受鼓舞。有人劝说王坤森捐款不必拾荒，宋文武也曾面临优质岗位和高薪补课的邀请，但他们选择了最朴素的助人方式。善意无门槛，每一份努力都有其价值。

帮助他人，回馈社会，是一份不断传递的感动。阅读两位老师的人生履历，皆是在艰难困苦之中有所成就，也曾有幸受过他人帮助。宋文武出身贫寒，南下打工，在妻子和罗姓教授的支持下完成学业；王坤森长于战乱，投身行伍，深切体会贫穷落后之苦，他的坚守换来街坊邻居的鼎力支持。善意虽小，却可传递，涓涓细流汇成江海。感念施助者的春风雨露，他们又在行道旁站成荫蔽，为前行的旅人遮挡风沙。

一滴水，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；一段佳话，亦可激励众人投身于助人事业。可喜的是，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，不仅培养出常怀感恩

的栋梁之材，也聚集起更多人为爱心助学贡献力量。宋文武永远地离开了，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“文武班”还将继续下去，助力新一届学生圆梦。王坤森的身体不再硬朗，但“王坤森助学金”在社会各界的踊跃捐助下，成为一笔持续的财富。

正如宋文武在文章中曾写过的：“这节课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终究还是要下课的。”王坤森或许也是感到不再年轻，郑重签署遗体捐献协议。生命的长度有限，善意则绵延不绝。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，让助学之暖不断传递，这份善意在轻叩你我的心扉。

（默达,载《南方日报》）

画话

破解预付式消费退费难

预付式消费在促进消费、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和方便的同时，也导致了许多纠纷，经营者跑路、退费难等问题日渐突出。破解预付式消费纠纷，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、强化监管部门协作，帮助消费者维权，还要引导消费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，合理合法维权。此外，还应探索第三方资金监管模式，保障资金得到有效监管。

（王琪 作，新华社发）



正视幼儿园生源之争

洞见

日前，有媒体发布调查称，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，在一些地方，民办幼儿园在近两年开始出现招生难，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。

从几年前的“入园难”“入园贵”到眼下的“一孩难求”，造成幼儿园当前招生困境的直接原因是适龄幼儿减少。自2016年起，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。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，2021年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805.21万人。如果2019年至2021年间出生的幼儿100%进幼儿园，也只有3727万人，幼儿园学位将“多出”将近1100万个。

由此看来，因适龄幼儿减少，幼儿园关停将不可避免，这是按照

当前的幼儿园班额以及学前教育模式作出的判断。但如果以此为契机，提高幼儿园建设标准，推进“小园小班”建设，提高师生比，并推进托幼一体化，把2至3岁幼儿的托育纳入幼儿园，将有助于拓展和优化现有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。

相关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，我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为319.10万人。由于幼儿出生人口减少，很多幼师担心自己的职业前景。然而，从教师幼儿比例来看，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的专任教师师幼比是偏低的，只有1：15，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在1：10左右，部分国家甚至达1：7。

师幼比的高低，直接关系到学前教育保教质量和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。如果把师幼比提高到1：10，我国幼儿园的专任教师并不会多出来，幼师的工作环境也能得到相应改善。当然，与之对应的是，需要加强对学前教育的投入，尤其是对

民办普惠园的扶持力度。

此外，我国当前存在幼儿园学位数“多出来”、托位数“严重不足”并存的问题。统计显示，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.5%左右。《“十四五”公共服务规划》提出，到2025年，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.5个。为此，我国各地相继出台政策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。笔者认为，其实完全可以把幼儿园多出的学位作为托位，为2至3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。国家层面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提出，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。而从现实看，随着适龄幼儿减少，几乎所有幼儿园都具备了招收2至3岁幼儿的条件。

要让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成为一个制度性的举措，上海的做法或可借鉴。去年，上海对推进托幼

一体化进行立法，制定《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》，以此统筹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。目前，从责任划分看，3至6岁学前教育由教育部门负责，0至3岁托育服务则主要由卫健部门负责，由此可能会出现各管各的问题。发达国家发展普惠托育，普遍采取的做法是把2至3岁幼儿纳入学前教育，因为这一阶段的托育已不只是看护，还具有了早期教育的功能。因此，推进2至6岁学前教育是适当的。

鼓励幼儿园招收2至3岁的幼儿，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根据区域内幼儿园的学位情况，确定新的幼儿园班额，把“多出”的学位用于招收2至3岁幼儿，对幼师进行适应托育的相应培训。同时，对幼儿园招收的2至3岁幼儿，给予一样的生均经费拨款，保障幼儿园的办学经费。

（熊丙奇,载《光明日报》）

品读

据2月26日《新黄河》客户端报道，近期，多地鼓励商业外摆，有的地方还形成了新的城市风景线，吸引众多市民前往打卡。规范的商业外摆，也在为消费就业赋能，值得探索尝试。

在山东济南老商埠，一些外摆试点成了网红打卡地，为城市增添了新鲜的生活气息和商业活力。这种“美好的人间烟火气”不仅是济南的风景也是全国的风景。为刺激消费潜力、提供更多就业机会，去年以来，广州、成都、苏州等地陆续试点鼓励商业外摆经营模式。

近年来，“城市管理温情执法”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，比如，江苏徐州城管队员在巡查时看到一群老年人沿街摆地摊，并未像过去那样出具处罚文书、暂扣物品，而是将此情况汇报后专门规划了一处“占道经营疏导点”，让摆摊的老人在指定场所集中经营。

温情执法是城市管理者回归本位的一种体现，即将管理更多地变成服务。维护一个城市的风貌和秩序很重要，但民生需求同样重要，城市的“脸面”和百姓的生存，本就不是一道单选题，这就要求有关方面做好引导和规范，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，实现城市秩序井然与市井繁荣的双赢。适当允许商业外摆，就是一种有益尝试。通过设置出店经营的时间、划定占道范围等，街道依然可以整洁有序，商家得到了便利也不再与城管“躲猫猫”。

当然，商业外摆并不是降低了此前的城市管理标准，而是通过这种管理方式上的“温情”以及科学性，找到城市管理、经济发展及百姓需求之间的平衡点。

新冠疫情发生以来，消费预期收缩，不少商家经营压力加剧，商业外摆成为烟火气回归的良好通道。据调查，全国多地出台商业外摆政策后，有地区商业街客流量提升了30%。

时下，商业外摆已经为城市经济增添了不少活力，也让有关地方和部门的治理理念、方式获得了百姓认可。期待更多地方能够抓住机遇、摸准人心、掌握经济发展规律，顺势而为，让城市的繁华在科学合理的治理中“一路生花”。

（郭元鹏,载《工人日报》）

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要立足“早”

微评

处在最天真烂漫快乐的人生阶段，但也会受心理问题困扰，出现抑郁、焦虑、失眠等情绪，严重影响生活和学习。近年来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不断凸显，近期“胡鑫宇事件”更是敲响警钟：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刻不容缓。

据苏州市广济医院(市心理卫生中心)统计,少儿心理门诊量逐年递增,就诊年龄也有所提前。以这个春节为例,不仅门诊量增加,住院病区刚过元宵节就满员了,要知道春节本是短暂的空床期,往年少儿精神科病房都要过完正月才陆续收治满员。

虽然从数据看，少儿心理门诊的就诊人数在增加、少儿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让人隐忧，不过其中也有社会更加关注少儿心理健康成长的因素。因为重视，才有了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治疗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是好事。

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？首先得重视，不能简单把青少年的情绪当成矫情或者青春期的正常现象，不能忽视或者选择无视已经肉眼可见

的情绪变化和不止一次的情绪表达，要真正把少儿的心理健康当成回事。其次，要找原因寻对策加大日常生活学习中的引导、疏导。心理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虽然形成的原因与诱发因素具有复杂性，但还是能找到一些共性的原因，比如学习上的压力与挫败感，又如家庭关系紧张缺乏沟通的空间，再如挫折教育的缺失等。有了心理疾病治疗固然重要，但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更应该把预防做在平常，拿出倾听的姿态，尊重他们的想法，营造轻松的、可以随时敞开心扉交流的空间和氛围，及时把压力与困惑化解，避免形成积压。

如何当好父母需要学习，如今家长学校、育儿书籍不少，作为家长应该学习与孩子沟通交流、给孩子情绪疏导的技巧，合理设置学习与生活的平衡，尤其要改变唯学习唯分数的思维，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与普通，给孩子心理减负。对于学校而言，要真正让心理辅导室、心理教师包括任课教师发挥作用，不仅要开设心理课堂教授学生调节情绪的能力，更应该在日常用心、细心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，重视学生的情感表达与体验。

（杨仲,载《苏州日报》）

谨防“纳米”产品变成“智商税”

纳米不粘锅、纳米水杯、纳米衬衣、纳米枕头……市面上的“纳米”产品可谓琳琅满目，但我们生活中接触最多的“纳米”产品，可能还是应用了100多项纳米技术却不怎么宣传的智能手机。目前，纳米材料在电子产品、家用电器、药品、化妆品、纺织品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很多真正应用了纳米材料的产品并不以此为卖点，反而不少跟纳米技术八竿子打不着的产品总是喜欢吹得天花乱坠。

这些所谓的“纳米”产品，除了水杯和枕头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种类。生产它们的商家，不过是在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借科学概念，行伪科学之实，通过虚假宣传甚至诈骗来攫取暴利。这些伪劣产品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，损害了消费者权益，还消解了科学的权威，挑战了法律的尊严。对此，监管部门应重拳出击，坚

决予以铲除。当然，市面上不少日常用品确实使用了纳米材料，并发挥了相应功效，比如涂有纳米涂层的不粘锅、加入了纳米材料的防污衬衣，以及普遍应用了纳米材料的化妆品等，我们不能“一棍子打死”。而且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纳米材料将会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不过，市场是复杂的，有良币就会有劣币。声称使用了纳米材料的产品，不见得真的使用了；真的使用了纳米材料的产品，也不一定就比没使用纳米材料的产品更好。产品的好坏，关键还是取决于品质。说到底，纳米技术只是一项技术而已，不必神话，当然也不必妖魔化。对消费者来说，要防止交“智商税”，除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外，拥有理性的消费头脑，可能更为重要。

（邓浩,载《经济日报》）

商业外摆也可以是一道城市风景